

An abstract painting featuring a river or path in shades of blue and white, winding through a landscape of warm, textured brushstrokes in yellow, orange, and brown. The composition is dynamic, with strong diagonal lines and a sense of movement. The overall mood is warm and evocative, suggesting a journey or a dream.

枕梦山河

欧阳黔森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枕梦山河／

欧阳黔森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枕梦山河 / 欧阳黔森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153-5040-0

I. ①枕… II. ①欧…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7688 号

责任编辑 侯群雄
装帧设计 刘红刚
内文设计 李 平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门市部 010-57350370
编辑部 010-57350401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710×1000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目录 /

报得三春晖 /	001
倾听花开的声音 /	019
水的眼泪 /	034
在昆仑山上 /	061
白层古渡 /	118
连山之殇 /	127
横断山中的香格里拉 /	142
武陵纪事 /	156
“正确”的第一个巴掌 /	166
穿越峡谷 /	181
远方月皎洁 /	187
有人醒在我梦中 /	197
十八块地 /	211

报得三春晖

这风这雨，千万年的酸蚀和侵染，剥落出你的瘦骨嶙峋；这天这地，亿万年的隆起与沉陷，构筑了你的万峰成林。这段文字是我对乌蒙山脉地区的最初印象。有了这样的印象，我的长篇小说《绝地逢生》的扉页，便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美丽，但极度贫困，这是喀斯特严重石漠化地貌的典型特征，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划分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当年写下这样的文字，无疑是需要勇气的，这勇气来自于我多年来深入乌蒙山脉腹地的走村过寨。我只要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什么叫“严重石漠化地区”，什么叫“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当年包产到户，有一户人家分了十八块地，最大的一块还不到三分地，其余的散落在沟沟湾湾之间，显得鸡零狗碎。在这一带，土地和人命是相连的，这家人当然要把自己的地扒拉清楚，但是数了半天，也就只有十七块地，正疑惑时，儿子捡起爸爸的草帽，草帽下石昏晃中碗大的一块地凸现出来，父亲高兴地说：找到了，找到了，就这块地，别看它小，也可以种一棵苞谷哩。这个故事在乌蒙山区谁都知道，二〇〇〇年我在乌蒙山区采风后，曾以这个故事为素材，发表过中篇小说《八颗苞谷》。这个故事讲的是越生越垦、越垦越荒，造成人口得不到有效控制、生态严重失衡的恶果。

乌蒙山脉，山高谷深、万峰成林，红军长征经过这里时，毛主席曾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诗《长征》，其中一句“乌蒙磅礴走泥丸”就是对这里形象的写照。这是一块红色的土地，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曾在这里建立了“黔、大、毕革命根据地”，其经典的战斗“将军山阻击战”“乌蒙山回旋战”在军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我在创作长篇小说《雄关漫道》和同名电视剧本时，曾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上看到：三军会师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毛主席在陕北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同志时，高度地赞扬了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为革命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他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其实，熟悉军史的人都知道，红二方面军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也还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的，共减员一万余人。为什么到达陕北还有一万余人，据党史、军史材料显示，二、六军团曾在贵州黔东地区扩红三千，在地处乌蒙山区腹地的“黔、大、毕”扩红五千余人，可以说，乌蒙山区的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〇〇九年三月五日，根据我长篇小说《绝地逢生》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当天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引起广泛关注。《绝地逢生》取材于贵州省的乌蒙山区，这里山多地少，是我国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长期以来党和国家在这里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一次次的救济和扶贫，使当地居民探寻到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开始摆脱穷困的命运。

然而，乌蒙山区群众并未完全摆脱穷困的命运。二〇一七年十月中旬，我再次来到乌蒙山区腹地深入生活，得知地处乌蒙山区腹地的毕节市还有七十二点四五万深度贫困人口。看到一份份为贫困群众建档立卡的资料时，我非常惊讶，它们精准到户、人，精准到因为什么而贫，精准到如何因人因户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脱贫举措……我不得不信服。我立刻动身，前往地处乌蒙山屋脊的海雀村进行采访。采访时，简直可以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我的心情。说实话，我写作已经很少用“震撼”这个词了，我已年过半百，很不容易被什么所震撼，今天我又用到“震撼”这个词，显而易见我的激动程度。

那天，我走进了村庄，路旁就有一户人家，我抬腿向这户人家走去，陪同我的朱大庚一边走一边大喊：“安大娘，安大娘！”我开玩笑说，别喊了，别动静大了吵扰到人家，到了我们敲门。

到了门口，不用敲门，门是开着的。总不能未取得主人同意就进屋吧，我停在门口。朱大庚又喊“安大娘，安大娘”！半晌，旁边一间屋的门吱嘎一声，露出一张满是皱纹的脸，我们赶紧进去。朱大庚一边扶着安美珍大娘回到火炉旁坐下一边大声说：安大娘，欧阳主席来看你了。安大娘没什么反应。朱大庚怕我难堪，对我说“大娘九十六了，耳背听不清”。见安大娘耳背，我也有些遗憾，毕竟我是来采访的，需要与人交流。但既然进来了，我还是要坐下来的，有些感受，也不是只有交流才能收获的。我们就围火炉而坐，炉中煤燃烧不充分，屋内充斥着煤气味。

不能与安大娘交流，我只好与朱大庚说话。我担心煤气会影响老大娘的健康，朱大庚手指挂满屋顶的苞谷棒子说：“这是在烤苞谷，屋顶周围都漏着风。这里海拔有两千三百多米，雾大，湿气重，苞谷不烤的话，怕发霉。”

既然安大娘听不见，我就不介意地对朱大庚说，在这里就别提什么主席了，就介绍我是欧阳作家，别把人弄糊涂了。

话音未落，安大娘突然讲起话来，只不过很难听清楚。仔细听，我才听明白几个字：习书记好！大恩人。

我贴近老人的耳朵说：老大娘，你说习总书记呀！

安大娘还是重复着习书记好、习书记好。说着说着，老人家一下站了起来，居然步履蹒跚地朝堂屋走，我赶紧扶着她，怕她跌倒。朱大庚见我紧张，跟在后面说：老人家身体好，还干活哩。

安大娘个子很小，估计不到一米五，这并不影响她伸出的手指，准确地指到一张挂像上。

我仔细一看，确实是习书记——担任过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

我一下子有点蒙。我经常走村过寨，在老百姓的堂屋正面墙上常挂的是毛泽东主席像，这几年也常见挂习近平主席像的。说真的，在贵州，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挂习仲勋书记像的。习仲勋书记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大西北的陕甘一带的老百姓中有着崇高的威望。我知道，这一带的老百姓对红军有着深厚的感情，二、六军团曾在这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海雀村附近的山谷里就曾发生过“乌蒙山回旋战”中最著名的战斗——以则河战斗。在有些老百姓家里面，我曾看到过贺龙元帅的像。

我的思绪飞到了远古。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两千六百多年前的春秋时期，管子就有了这样的思想，无疑是伟大的，然而他却生不逢时，那时候，他的“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的理想很难实现。今天，中华民族进入了伟大的新时代，我们不仅

要富起来，而且要强起来。管子还说过：“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管子的“善分民”即是善于与人民分享利益，而于当今来讲，“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句话，无疑高于管子所说，显得是那样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我认为管子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和思想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他空怀的壮志与治世理想，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得以实现，即便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不可能有今天这个伟大时代对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同步小康，一个都不能落下。说实话，大家都是读过史书的，我们都明白，无论是开元盛世的帝王，还是“善分民也”的英主，他们所统治的帝国，不可能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分享到盛世的红利，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便是鱼米之乡的富足之地，由于受封建地主的剥削，一贫如洗的老百姓不在少数，何况地处边远、蛮荒、不毛之地的老百姓，再英明的君主也是鞭长莫及。再说，封建王朝的以人为本，和当今倡导的以人为本是截然不同的。在我看来，不管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以何种形式、何种姿态以人为本，归根结底还是巩固皇权，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剥削阶级权益。而在当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执政理念，这个理念才是以人为本的本质所在。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执政理念，就是把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的宗旨具体化、目标化。数百万干部下乡实施精准扶贫，并锁定目标，在二〇二〇年全民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是人民至上的伟大工程。

以我在老少边穷地区长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亲身经历，可以说，精准扶贫，普天之下，没有惠及不到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放眼人类历史上任何变革和改变历史进程的宏大战役，都不能与这一场对淤积了几千年的贫困症结所开展的脱贫攻坚伟大战役相提并论。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总是愿意与乡亲们在一起促膝谈心。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是兄弟姊妹，也是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这样，他们那朴实无华、勤劳善良的秉性，成为我体检自我的一面镜子；老百姓那最朴素的价值观——饮水思源、感恩戴德，于我而言，也是感同身受的。

所以，如果陕甘一带的老百姓发自内心地挂习仲勋书记的像，我丝毫不觉得意外，然而在地处大西南腹地的一隅，看见老百姓家里高挂习仲勋书记的像，确实让我有些意外。

朱大庚见我一脸的好奇，一边扶着安大娘往回走，一边对我说：几句话讲不清楚，我们坐下慢慢说。

安大娘的火炉四周散热不充分，屋顶还透着气，房间里并不温暖，但朱大庚一开讲，听着听着，我胸膛里的热血就沸腾起来。

朱大庚是从一名叫刘子富的记者讲起的，这名新华社记者于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来到苗、彝族混居的海雀村，看到农户家家断炊，安美珍大娘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安大娘家四口人，全家终年不见食油，一年累计缺三个月的盐，四个人只有三个碗，已经断粮五天了。在苗族社员王永才的家里，王永才含着泪告诉记者，全家五口人，断粮五个月了，靠吃野菜等过日子，更谈不上吃油、吃盐。耕牛本是农家的命根子，也只得狠心卖掉买粮救人命，一头牛卖了二百五十元，买粮已经花光了。耕牛尚且贱卖，马、猪、鸡就更不用说了。在他家的火塘边，一个三岁的小孩饿得躺在地上，发出嗯嗯嗯的微弱叫唤声。手中无粮的母亲无可奈何。

刘子富在海雀村民组一连走了九家，没发现一家有食油、米饭的，吃的多是玉米面糊糊、荞面糊糊、干板菜掺四季豆种子。这九户人家没有一家有活动钱，没有一家不是人畜同屋居住的，也没有一家

有像样的床或被子，有的钻草窝，有的盖秧被，有的围火塘过夜。

刘子富又走进王朝珍大娘家，一下就惊呆了。大娘衣不蔽体，见有客人走来，立即用双手抱在胸前，难为情地低下头。她的衣衫破烂得掩不住胸肚，那条破烂成布条一样的裙子，本来就很难遮盖，一走动就暴露无遗。大娘看出了记者的难堪，反而主动照直说：“一条裙子穿了三年整，春夏秋冬都是它。唉，真没出息，光条条的不好意思见人！”大娘的隔壁是朱正华家，主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早在去年年底就把打下的粮食吃光了；几个月来，找到一升吃一升。”

苗族青年王学方带刘子富一家家看，告诉他：目前，全组三十户，断炊的已有二十五户，剩下的五户也维持不了几天。组里的青年人下地搞生产，由于吃得差，吃不饱，体力不支，一天只能干半天活，加上人都得外出找吃的，已经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

这些纯朴的少数民族兄弟，尽管贫困交加，却没有一个外逃，没有一人上访，没有一人向国家伸手，没有一人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情景令人十分感动。

朱大庚讲述的是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刘子富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二日向上级写的内参——《赫章县有一万二千多户农民断粮 少数民族十分困难却无一人埋怨国家》描述的情景。

朱大庚介绍说：“这篇俗称‘黑头内参’的‘国内动态清样’刺痛了许多领导人。当时分管农村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作了如下批示：‘有这样好的各族人民，又过着这样贫困的生活，不仅不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是对我们这些官僚主义者一个严重警告！！！请省委对这类地区，规定个时限，有个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当时，老百姓奔走相告，中央习仲勋书记批示了，我们有救了。

有的人文化不高，也讲不清批示内容，逢人就说，吓人得很，三个惊叹号。”

听到“吓人得很”，我由衷地笑起来，这话太朴素了，这是贵州老百姓表达某种事情很重要、很振奋时的一句口头禅。

这三个惊叹号，后来我在“文朝荣先进事迹陈列馆”中看到了。当习仲勋书记批示的原件展示在我眼前时，那三个惊叹号实在太耀眼了，不由令人心潮澎湃。当时，我的大脑里就闪现出一个慈祥的老人，目光如炬，扬眉挥笔。这三个力透纸背的惊叹号，使我感觉出，这个慈祥老人一气呵成的批示，似当头棒喝，如醍醐灌顶，振聋发聩。

我与朱大庚的交流似乎影响到了安大娘的情绪，她也兴奋起来，开始讲话。我们当然要停下来，听老人讲。可是，我只能听明白白之二三。不过，说到习仲勋书记，她依然讲得很清晰。这是一个九十六岁老人的珍贵记忆，是一个基层老百姓的感恩之心，非常朴实，十分感人，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一个伟大的民族从不会缺失记忆，一个失去苦难记忆的民族是失语的民族，而一个失语的民族注定没有未来。我想，参加过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扶贫攻坚的人们，他们的经历便也成了我们民族集体经历的一部分，此后，便成了我们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它无疑会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记忆，并代代相传。

不畏苦难，并有战胜苦难的决心，这就是拥有自信、力量和智慧体现。

三十三年前，贵州省委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用明传电报传来习仲勋同志的重要批示后，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同志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并抽调得力干部星夜兼程赶往赫章县海雀村，查看缺粮断炊情况后，一次发放十万公斤粮食，及时赈济饥民。海雀村山沟里、

山坳上，人背马驮政府发放的救济粮到家，纯朴的乡亲们脸上挂满笑容，都发自内心地说：“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

那年，安大娘六十三岁。三十三年过去，回忆起当年刘子富来到她家的情景，安大娘记忆犹新。我需要朱大庚当翻译，不过安大娘不断念叨的“习书记、刘子富”，我已耳熟能详，是不用翻译的。

朱大庚说，这些年，一拨又一拨来扶贫的干部、领导都到过安大娘家，但安大娘年纪大了，谁都记不住，来过她家的人，她只记得一个人，就是新华社记者刘子富。

我问：“朱大庚同志，你是抓扶贫工作的，你来过安大娘家几次？”

朱大庚说：“前后最少有七次吧！”

我说：“安大娘应该知道你是谁吧？”

朱大庚摇摇头：“她不知道！”他扭头看了看还在念叨的安大娘说，“她知不知道我是谁不要紧，要紧的是我知道她是谁。”

这话有点熟悉，我想起一首唱解放军战士的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这首歌曾无数次感动过我。听到朱大庚脱口而出类似的话，一股暖流涌上了我的心头。看着安大娘饱经风霜但安详的脸，我对朱大庚说：“大庚，你这句话有点像诗。”

朱大庚感觉到了我把“朱大庚同志”换成了“大庚”这个变化，有些腼腆起来。我一直相信，能这样腼腆的人，一定是一个心怀善良的人，而一个心怀善良的人，必定是不愿说诳语的人，由此，我坚信大庚那句让我感到熟悉的话语一定是发自肺腑的，由此，我很自然改口叫他大庚。我们之间一下没有了距离。

我一贯坚持眼见为实，尚未到达的地方，不愿意多听别人介绍，不喜欢别人来引导我的言行。我更愿意靠自己看，让自己多思考。我长期在乡下深入生活，在采访中，遇见过不少那种嘴巴说得好其

实干不好的基层干部，这也是我一贯坚持眼见为实的缘由。昨天，我从贵阳跑了四个小时，到了赫章县城见到朱大庚，我就不大听他讲，他讲多了，我还不客气地质问。我说：“据我所知，毕节还有七十二点四五万贫困人口，赫章县就有一十四点九八万，离脱贫时间点还有两年的时间，你们是数字脱贫呢，还是真正的能脱贫？”

朱大庚说：“哪里敢弄虚作假，从中央到省到市都有第三方评估和巡察、督察制度，弄虚作假就是找死。”

我说：“眼见为实。”

他说：“你想去哪里？”

我说：“海雀村。”

之所以脱口而出海雀村，是因为两年前贵州人民出版社找过我，请我写一部关于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朝荣的报告文学。按说我责无旁贷，可我手里有省委宣传部重点影视剧《云上绣娘》的创作生产任务，这是一部反映精准扶贫的农村戏，我不可能撇下它。两年前茅与海雀村失之交臂，但我记住了它，这次到毕节采访，当然不能再擦肩而过。

这些年，我也很关注新闻媒体报道的贵州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比如说被誉为“愚公精神”的罗甸麻怀村邓迎香、赫章海雀村文朝荣，以及被誉为“老黄牛精神”的播州区团结村黄大发等。除了海雀村以前我没有实地采访过，麻怀村、团结村我都现场采访过。我对先进人物的事迹和精神，以及记者不辞辛劳的采访和报道表示崇高的敬意，然而略有遗憾的是，这些报道几乎都是着墨于主人翁如何以“愚公精神”和“老黄牛精神”改变当地生存环境以及脱贫的奋斗过程，这样写，不是不好，而是缺少思考。

我认为，“愚公精神”“老黄牛精神”在这个时代弥足珍贵，

是要大力提倡的，这与当今在扶贫攻坚战中提出的“扶志”是相符合的。这就是“要我脱贫”和“我要脱贫”的区别：“要我脱贫”是被动的，而“我要脱贫”是主动的。

邓迎香、黄大发、文朝荣的事迹，可以说是“我要脱贫”的生动代表。在我看来，“愚公移山”这个古老故事的本意，更多强调的是精神层面，而事实上，我们都明白，愚公用几把锄头、几个箩筐，即便加上他的子子孙孙，要想把门前的那座大山搬掉，几乎是不可能的。山是不能自己走的，人可以走嘛，是不是非得要移山？这个道理其实谁都明白，所以，古人把这个移山的老人归为“愚公”是有道理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为愚人。换句话说，明知不可为还要为之，是为精神可嘉。所以，“愚公精神”应该大力提倡，而他的做法并不可取。

在“愚公”问题上我啰唆了半天，主要是想说明，邓迎香、黄大发、文朝荣这些当代愚公和古人所说的愚公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试着分析一下：首先，他们都有愚公试图摆脱困境的志向，也有愚公移山这种可贵的精神，但是，仅仅有这种移山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以我长期在扶贫攻坚一线采访的所见所闻，我认为，如果没有共产党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地扶贫攻坚，以及一系列的扶贫政策和措施，就不会有当代“愚公”扶贫攻坚的卓越功勋。

告别安大娘，我来到“文朝荣先进事迹陈列馆”。看完后，我的感觉是，它不仅仅是“文朝荣先进事迹陈列馆”，更是贵州毕节试验区扶贫攻坚三十年的一个缩影。在这里，我首先看到的是习仲勋书记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针对海雀村的批示。这个批示，拉开了中国政府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的序幕，而这个拉幕人，就是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我记得，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曾聆听过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番话：

“贵州的改革有很多独到之处，比如毕节试验区，这是胡锦涛同志任贵州省委书记时亲自倡导建立的，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各有关方面锲而不舍地关心、推动、促进，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我还找到了当年我父亲的一段批示……”

一九八五年七月，恰逢贵州省委主要负责人交替，当时刚刚上任贵州省委书记才八天的胡锦涛同志到赫章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考察，并不辞辛劳地坐车前往海拔两千三百米高的海雀村专程走访。那个时候的赫章县，总人口四十七点零四万，其中农业人口四十四点三九万，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一万两千五百零六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六千八百三十六万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一百六十六元。全县几乎没有通村、组的公路，运输主要靠人背马驮。除县城和少数乡镇外，大多数乡镇不通电，照明以煤油灯为主，一般乡镇都没有医疗卫生机构，群众看病非常困难，农民住房几乎是茅草房和瓦房，边远山区有不少农民住简陋窝棚。“山高水冷地皮薄，气候灾害异常多；耗子跪着啃苞谷，种一坡来收一箩。”这首民谣是当时赫章县农村贫困面貌的真实写照。“贫困”一度成为赫章县的代名词，而海雀村，又是赫章县贫困的代名词。海雀村，距县城八十八公里，全村苗族、彝族群众，共计一百六十八户、七百三十人。境内山高坡陡，耕地贫瘠、零星破碎，二十五度以上陡坡耕地占百分之九十。村里无学校、无卫生室，读书、看病都要步行到十二公里以外的乡政府所在地。不通公路、不通电，生活饮水主要依靠收集自然降水，整个村庄几乎与世隔绝。有瓦房十二户、草房一百一十四户、简易窝棚四十二户，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户人畜混居。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

三十三元，年人均占有粮食一百零七公斤，全村有小学文化的仅有五人。为求生存，盲目过度毁林开荒种粮，森林覆盖率锐减到百分之五以下，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极度恶劣，自然灾害频发，大风一起，沙尘漫天。

胡锦涛书记考察、调研后，语重心长地指出：“今天我在这里说，明年我还要来，反正瞄准你赫章了。因为要使我们这样一个黔西北的边远贫困县，能够不辜负党中央的希望，在省、地、县及其干部、群众的努力下，争取尽快改变赫章的贫困面貌，这就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根据胡锦涛书记的指示，经过省委、省政府的努力，一九八八年六月九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贵州省在毕节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报告。

从贵州“八七”扶贫攻坚战到毕节试验区的建设，至今历时二十九年，可以说，在这二十九年当中，试验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我在二〇〇八年创作的长篇电视连续剧《绝地逢生》中有所展示。电视剧讲述的是一个村庄，在村支书的带领下，不折不挠、因地制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把一个石漠化严重、不适合人类生存的不毛之地，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村的故事。

不知不觉九年过去了，毕节试验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在“文朝荣先进事迹陈列馆”的资料中阐述得非常翔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试验区的两次批示尤为醒目，特别是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五日的重要批示：“毕节曾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典型。毕节试验区创办二十六年来，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普遍贫困到基本小康、生态环境从不断恶化到明显改善的跨越。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长期支持，广泛参与，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